

北京同志文化交流中心座談實錄

時間：2008年9月11日 19:00-21:00

地點：北京同志文化交流中心

主持：北京 愛知行研究所 趙珂

引言：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丁乃非
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黃道明
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甯應斌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王 蘋

實錄上網 <http://tw.youtube.com/watch?v=Ty1NMLuWOT4&feature=related>

何春蕤：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可以作為今晚討論的開端，因為我看到各位剛才所提的大部分問題都圍繞著某個思路在想，所以我想先把問題丟出來，你們講了，我們再講。這個問題就是：「你們覺得現在大陸有同志運動嗎？」

觀眾1：我個人感覺是有的，就是說屬於一個雛形階段。因為以前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群體，也非常分散，只要這個群體聚到一起，馬上可能相關的人士就要來了。可是今天晚上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各個領域的人、NGO、不同的組織都過來了，至少這個會好像沒人會打擾，也就是說，大家至少已經走過了那種最初期的恐懼或者說警察的非法盤問。能夠走到一起的話，基本上就可以說是同志運動的一個雛形。

榮文毅：這裡有一個前提，剛才的朋友說是有，但是問題是，什麼叫做運動？做為一個運動，它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口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訴求？然後有沒有什麼策略來實現這個訴求？有沒有一個組織？我覺得把這些都說完了，可能咱們在座的各位朋友才能知道我們是不是形成了運動。

觀眾2：從我在同志社區外部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同志運動肯定有。因為真的在中國有那麼多的同志組織，就在其他很多領域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覺得同志運動不僅有運動，而且在中國很前衛，走得很前，很靠前。在很多領域如果提到組織的話，都會感到恐懼，很多人都會馬上跳到一個非法組織，腦子裡就會覺得是反革命組織，但是我們中國現在有這麼多的同志組織，所以我覺得大家思想是夠解放、夠開放的，步子邁得已經夠大了。

問：不過，我想問的是，在愛滋病來臨之前，在愛滋病的資金進入中國之前，有多少個這樣的組織？我覺得那個數目跟現在的數目是不一樣的，而且差距非常大。你看現在的同志組織，有多少個是以做愛滋病為主的？

觀眾3：就在北京這個小範圍吧，比如說有好多同志組織，我不知道有多少個，

我只是猜想有無數個同志組織，那它們怎麼進行溝通？肯定它們的家庭背景、信仰方式、生活方式、審美方式、意識形態都不同。這種情形怎麼辦？

黃道明：我剛剛聽到一個說法非常好奇，就是後面的那位先生認為中國同志運動有而且比其他的一些組織來得更「解放」，是不是？我對這個說法有興趣，因為我的聯想就是關於人的各種性（包括性慾望、性傾向、性幻想的各種個別差異）的解放。但是在現有的體制下，你並沒有辦法去表達、不能自由的去表達你所要的、你愛的、你慾望的，所以你用「解放」這個詞來描述同志運動，我覺得很好奇，顯然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甯應斌：不過我也插一句，我覺得有沒有同志運動，跟組織數量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你認為台灣有同志運動的話，台灣的同志組織大概不超過 20 個，當年共產黨也只有一個組織，所以我覺得組織的數量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也許王蘋可以講一下，台灣的同志運動曾經有過一個爭議，就是當時有一種聲音說：「所有同志都應該 come out，這樣才能去把同志權益爭起來」，這個出櫃的問題引發了一個很大的辯論，後來不知道怎樣走過了這個階段，也許王蘋知道更多，可以談一下。

王蘋：我先回應「解放」，這樣你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黃道明會問這個問題。台灣不太用「解放」這兩個字，「解放」這兩個字是有某種政治污名的。當年我跟丁乃非在婦女團體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團體稍微進步一點，所以我們在寫我們團體的宗旨是什麼的時候就寫了：「反對有關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達成婦女的解放」。我們寫的時後開心得不得了，想說如果這個可以寫上去，這個團體就可以繼續工作下去。可是拿到董事會去，每個董事什麼都不看，就只看這兩個字，說「這兩個字什麼意思？怎麼敢用這兩個字？用了這兩個字，我們這個團體就開始有問題了。」何老師也提過「性解放」的言論，這個言論在台灣也是引發負面評價的，女性主義者還為此開過一個記者會，背後掛著一個大橫幅，上面寫著：「情慾自主不等於性解放」。其實情慾自主跟性解放不是一樣的嗎？怎麼看都一樣，可是女性主義者就講得很大聲：「不等於性解放」。為了這一句話辦了個很大的記者會，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黃道明聽到你們說「解放」也會覺得有興趣。十幾年前，台灣的同志組織剛開始，也很小。台灣 1987 年解嚴之前是戒嚴狀態，不太能搞組織，聽到組織也是有點緊張，只能弄小小的讀書會，像今晚這樣規模的聚會大概都會有人關心，會有人打小報告，主其事的人有可能會被約談。1987 年之後稍微開放一點，就有一些小團體出現，1992 年第一個女同志組織出現，可是在有組織之後也只是聯誼啦，沒討論什麼國家大事，就是認識朋友最重要，交筆友啊、約了去爬山啊、喝茶啊。過了沒幾年，有了一些從西方引介來的言論，也出了一些同性戀歷史書，大家就開始討論，然後 1995 年有同志學生組織出現，開始討論正式的議題。這個時候，「出櫃」就是一個重要議題。比較有西方概念的就認為出櫃是必要手段，不然社會怎麼知道你存在？我們怎麼組

織自己？可是有些人認為，家庭有這麼大的壓力，我怎麼可以出櫃？所以這兩方就形成很大的張力。後來 1996 年在台大體育館辦了一個同志甦醒日的活動，其實那天人還蠻多的，大概兩百人以上，現場就有不同的辯論。當然中間也提到在華人社會裡，家庭跟我們之間的關係很特殊，而這個關係跟西方不同，所以出櫃要有和西方不同的想像和發展，辯論很久後一直都有不同的聲音。後來又發展出另一個說法，說反對個人出櫃，要搞集體出櫃。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懂什麼是集體出櫃，說真的。反正就是要搞集體出櫃，要辦集體活動，要讓社會知道，因此就要辦記者會，那時候已經解嚴了，面對社會和媒體，壓力不在於政府打壓，而是家裡會看到，所以記者會就得做點變裝，比如說短頭髮的就會戴長假髮，長頭髮的就會弄個短假髮，然後戴墨鏡啊、嘉年華面具啊。早期如果辦記者會，很多照片都像嘉年華，你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很 trans。所以其實集體出櫃也都有壓力，一直到現在，出櫃都還是一個議題。能夠在媒體上公開說我是同志的，其實還蠻少的。

甯應斌：我也講一個小故事。那個時候搞集體出櫃的活動其實很有意思，因為有時候一些支持者、社運的朋友為了表示聲援或者好玩，也戴面具，但是他們戴面具以後，真正的同志反而不需要面具了，因為媒體都在注意那幾個戴面具的，認為戴面具的一定是同志，而不戴面具的一定是跑來支持的。所以整個場面的翻轉很有意思。

王蘋：這個故事我在現場，我可以講。有一年 GLAD 在台大的門口辦了一個舞會，有舞會就要發媒體，可是你也知道那時候辦活動有媒體來，肯定要戴面具的，所以主辦單位就很貼心的準備好多面具在旁邊，然後跟那些從中南部來的鄉親說：「我們辦一個活動，大家一起來，沒問題的，如果你怕，我們這裡有面具幫你準備好了。」然後天黑之後三三兩兩的在角落啊樹下啊偷偷摸摸來戴面具。不過因為人在一起有時候集體意識很奇妙，你會忘了你害怕，然後大家就 high 的不得了，把自己打扮的非常美麗，頭髮染了綠色、黃色，主辦單位一堆人也 high 的不得了，媒體就來拍，大家在鏡頭面前拼命跳舞，說「拍我，拍我」。可是鏡頭就不理她們，對她們沒興趣，一直去掃射現場誰戴了面具。那時中南部的鄉親好可憐喔，被追得到處跑，跑到黑黑的樹下躲起來。我就想說：天啊，你好不容易有勇氣這樣出了櫃，我們互相支持對方，都出櫃了，卻沒有人理你耶！就覺得當個同性戀好不堪喔！打扮的這麼美，完全沒有鏡頭要理你，這才要生氣呢。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社會互動。

觀眾 4：剛才聽榮文毅老師說一個運動應該有發起、有口號之類的。但是我觀察覺得也許可以說我們同志還是有運動的。但是它的型態是怎樣？它肯定不是一個口號，因為同志群體是多元社會的一部份，它本身也是很多元的，每個人的利益、每個人的訴求也是不同的。比如當我提出同性婚姻的口號的時候，其實不是所有同志都會支持，很多人是反對或者是保持中立、或

者無所謂，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可能統一的口號是很難有，但是觀察這幾年中國大陸同志的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大家開始認識自我了，就是向自己出櫃，自己對自己承認自己是同志，去面對自己的情慾，去追求自己的生活。這個我覺得是運動的第一步。

觀眾 5：有一次我們在「拉拉沙龍」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之前我們有一些朋友在一起討論的時候，好像以前電影裡面那種地下黨員，就是大家在一個很小的環境裡面很熱烈、滿頭大汗、很有熱情的去做一些事情。我其實就突然意識到這是運動的另外一個涵義。

何春蕤：各位的討論很有意思，我現在想再多講兩點，因為我覺得是不是個運動，還有兩件事需要談，當然並不是說這兩件事是唯一的要件，而是開拓另外的層面來想想。第一樣，比方說台北有沒有性工作的運動？從 1997 年開始大概有兩三年，非常清楚的有。這個「有」，不單單是說人聚集在一起要求她們的權益，而是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聚集起來的人的「變化」。換句話說，像剛開始的時候，當台北公娼出來爭取她們的工作權的時候，她們都是帶著面具、戴帽子遮臉的、不給所有人看到的、聲音很小的、希望別人代言的。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慢慢地看見她們脫下帽子、脫下面具，她開始講自己的話，她開始慢慢學習其他的運動能訴求什麼，她去套用公共的語言，套用婦女運動的語言，把很多已經存在的其他組織和運動的口號，轉化成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口號。而在這個過程中，公娼自己本身在轉變，她變成有力量了，不需要你再代言了：「我知道我要什麼了，因為我越來越長成了有力量的主體。」我認為這是一個運動的基本要件。各位想想，不是說今天有一群同志聚集在一起，想個口號、想個訴求，這個運動就成形了，好像我們就是一群已經完工的成品。不，運動是有一個改造過程的，這個改造過程也是一個運動能不能持續、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跟其他的運動對話、能不能跟這個社會其他的、主流的、霸權的這些主體「對話」的重要條件。換句話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長了嗎？我們變了嗎？我們的語言豐富了嗎？我們學了什麼東西嗎？除了主體改造之外，另外還有第二樣，我們能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我們跟其他群體之間的「關係」？一個運動和另外的運動是不是應該聯盟合作？在我們考量是不是有運動的時候，這就是很重要的指標：兩個運動在合作的過程當中，互相看到，互相學習，看到彼此中間原來是有關聯的，原來她們兩個都同樣受制於同一個壓迫的體制，同時受害。例如同志和跨性別，她們兩個的受害不是兩碼事，而是面對同樣的一個異性戀、男女兩性的體制。如果沒有看到這樣一個聯繫，沒有設法建立聯盟的關係，只是關起門來說，「嘿，我們是一群人、我們有個訴求」，這樣跟社會的對話是不足的，因為這個社會不是這麼簡單的，這個社會有同志，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群體，這些群體之間彼此的關係、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受到同一個體制的壓迫而互相看不見。壓迫體制操作的方式就是讓你覺得你跟她不一樣，你們不能團結，因為你

們要是團結了，一起來反這個體制，這體制就完蛋了。所以運動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要有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不單是主體個人的轉變，也是主體群體性的產生，也是主體的群體跟別的群體互相看到她們在一個大體制中有怎麼樣的相對、可能相同、可能差異、可能有時可以連結在一起的這個「關係」。

甯應斌：我不太同意你啦。

觀眾 6：我們非常想知道，各位的研究也就是自己做的工作的意義。各位研究已經很深入，學者是怎麼想這個意義？包括你們對於這項工作的推動，還有對於這整個社會進步的推動。

王蘋：我覺得我其實就是一個實踐者，很多事情當然就是有理想，就是像知識分子一樣有個理想，覺得社會應該要有公義，看到不公平就要拔刀相助，可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塊是回到自己身上。我參與過工人運動，非常認同工人，但是我覺得那個認同在思想上比較多，在工運的同時，因為接觸到女工，就看到那是跟我的性別有關的。原來我在工人運動裡頭覺得我不太有主體性，我就是個知識份子，我覺得那裡不是我能夠參與的，可是在女工們那一塊，我在跟她們生活的過程裡感受到一個跟我有關的部分，可是我還沒想清楚。後來有機會去婦女團體工作，我就認識很多各型各樣跟我很不一樣的女的，譬如說有把先生殺了的、離婚離不掉的、先生有外遇，老婆就打電話來說「我現在只想去開車把我自己給撞死，把所有小孩帶在車上，我死光光就好了」，這些都給我很大衝擊，我就學習了很多。我覺得那些學習到最後都回到我自己身上，就會覺得這社會真有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我腦子去想，我會用我自己的經驗去跟她們互動，在這個過程裡我真的學習很多。我在一個婦女運動的團體裡面就很清楚看到，連運動方向都是有上級的，上級會決定我們今天要怎麼走。我在那個女性主義團體裡面聽到很多，上級們都會跟我說，女性應該怎樣怎樣，我們就是要爭取兩性平等。我就說，那女工呢？「女工哪是女人啊，那是工人。」愛滋感染者的議題？不好意思，我現在誇張點說，比較戲劇效果。「愛滋感染者？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這個議題在這個社會太不主流了，我們現在做這個事情，浪費資源。」我聽到太多排除各種各樣主體的，包括性工作者或其他。有一天我發現，這個辦公室除了我以外，很多女同志耶！我們那個工作室有七個人，最盛期有六個是女同志，我們在這個婦女團體裡面工作，幫她們爭取婚姻權啊、工作平等啊、教育均等、然後要參政啊、要算佔幾分之幾的比例等等。我們就覺得很不耐煩，想說「哎，什麼時候輪到談談我們的議題？」就跟她們講要談女同志的議題，結果她們不好意思當面反對你，但是出去郊遊的時候就在車上說，「跟你講啊，那些在我們團體裡搞女同志的，這些根本都是有問題的，就很像情報份子滲透到這個組織，就是要把我們搞垮的。」她們說的就是我們這些人〈笑〉。我覺

得，天啊！這就是跟在美國的運動發展很類似，我的意思就是說，在每個過程裡，其實你參與，你也會看到某種非常現實的權力運作，即使在所謂的運動團體裡也一樣。運動的方向是大家共同打造的，什麼平等互動，本來就是嘴巴講講的，你實際參與在裡面才有可能去改變一些事情。每一個可以改變的時候，就是應該在有限的範圍內發出聲音來。

何春蕙：從我的角度來說，也許大家要了解一下，在一個社會裡，不單單只是運動做一些什麼樣的組織工作或者發表什麼樣的刊物或者辦什麼樣的行動、遊行之類的就算了，因為在不同的層面上有一些既定的觀念、價值觀、理論、說法、認知，這些都需要有人去擋。我們這些研究者有時候在我們自己的學術旅途上，比方說遇見了跨性別、遇見了性工作者，而在這遇到的過程中發覺，主流的話語其實沒有對於性工作或是跨性別任何正面的描述，總是說他們有毛病、懶惰、變態，或者愛慕虛榮、喜歡漂亮、心理有毛病等等，總是各式各樣負面的成見，很少正面的說法，也很少貼近他們生命的說法。我們所做的事情其實是透過跟主體實際的貼近而生產一些不一樣的說法，比方說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做性工作研究，他會去生產很多有關性工作的知識，這些知識在理論的層次上、學術的層次上有它的意義，因為可以對抗那些病理化性工作、或者罪犯化性工作的學術知識。所以說，在學術的領域裡是有戰爭要打的，如果只是在街頭行動，在認知的層次、理論的層次、學術的層次上面不去打仗的話，每次官方看到有人提出維權的要求，就可以說「某某大學某某教授曾經做過這方面研究，這些人多半都是有問題的人，你們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知識可以用來做為一個壓迫的力量，幫助政府去控制這方面的人口，抵抗這個維權的要求，所以在學術的層次上，戰爭有時候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因為學術裡的對抗也很重要。只要你們能夠跟學術人連得上線，學術人能生產積極的話語，這裡面就可以形成另外一些互相合作的機會；同時，學術人也有很重要的學習工作。我很不幸因為沒有被生成女工，雖然我做過幫傭的工作，對於勞動、剝削有一些認知，可是我畢竟不是在工廠、在群體工作下的勞動者，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真正知道勞動現場的問題。我不是性工作者，有時候沒有辦法知道性工作面對的困境，但是透過我的研究、透過我去現場蹲點，跟她們學、看她們工作、了解她們說話，透過我掏心挖肺地去跟她們互動，她們願意告訴我一些實際的狀況，然後我做一個非常紀實的、歷史社會文化的分析，希望在這裡有一些另類的知識生產出來，這是我覺得在學術裡面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我就這麼做了。

丁乃非：我是研究文學的，跟一些朋友一起做了一本書，就是《罔兩問景》，我們其實就是在做女同志的70年代跟90年代的小說研究。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裡也在企圖重新閱讀70年代跟90年代這些小說裡頭女同志的書寫，這些書寫裡記錄了一種歷史的掙扎或者歷史的衝突，譬如說邱妙津的小說裡頭是有跨性的一些痕跡或者慾望，可是在那個時候的女同志

或者女性主義女同志的思維之下，跨性的女同志其實是很難自我表達的。這就是我們幾個一起寫的那本書企圖在挖掘那個難以表達，到後來可能甚至於難以閱讀的那些女同志的複雜表達。這些複雜的表達有時候在一個過程裡頭會被簡化，慾望會被簡化、過程會被簡化，很多東西都會有一點不是那麼看得見了。

甯應斌：今天基本上大概有男同志團體或者女同志團體在這裡吧，可能偏重的項目不一樣，也許有的比較關心愛滋等等。但是我相信在你們心靈深處都非常清楚知道，一個同志運動不可能說只有我們男同志成功然後女同志運動完全沒有發展，而我們男同志還能繼續發展，最後我們男同志都得到解放。這不可能！如果男同志真的有一天能夠得到很多權利，那不可能女同志沒有什麼權利，除非你是在一個非常排斥女性的社會，但是這也幾乎不太可能。一個社會不太可能一直只有一種運動，除非就像大家剛才一直講的是一個非常排斥的運動，它把其他所有人都排除掉了以後，變成一個非常陽光非常乾淨的少數樣板，不過即使這樣它也不能算是成功了。沒有錯，同性戀運動跨越了一些界線，可是它可能把同性戀、異性戀這個界線也同時又鞏固了，好在跨性別也會再模糊這些界線的。比如說，我可能是生理男性，我變性成女人，然後愛了一個跟我同樣從生理男性變成女人的人，那我們倆之間是什麼？懂我的意思吧？所以這種跨越事實上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打開很多社會空間。從同性戀運動來講，性別跟性這兩個領域是一定跑不掉的，發生了很多事情都會跟同性戀運動是相關的。一個社會比較容忍色情、容忍賣淫，這樣的社會它對同志也會是寬容的；反過來講，社會對同志寬容，通常也會比較對色情或賣淫寬容。所以這些運動其實彼此都會有關係，有一些社會學的研究也顯示，很多運動彼此的構成分子有時候也有一些流動的現象，而且有的時候一個運動會影響到另外一個運動，替另外一個運動打開空間和條件，然後再反過來打開自己的空間和條件，這都非常有可能。

王蘋：我就在運動裡長大，我參與了不同型態的運動，我一直以為除了自我改造，還有一個我個人的想法。當我感受到社會有問題，我想跟大家結盟在一起去做社會的改造，那當然得要先自我儲備自己，展現我的實力。實力有很多種展現的方法，不同的社會，展現實力的方法真的不一樣。台灣解嚴之後我們或許可以去遊行示威了，但是我也不覺得遊行示威是唯一的方式，譬如說台灣現在每一年有個同志大遊行，說真的，你問我同志遊行跟運動有沒有關係，我都還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遊行現在已經跟西方很類似了，我們有一點商業化了，我們得到了商業的贊助。然後去參加遊行這個活動，比起你平常在教室裡老師叫你明天隨堂測驗介紹同性戀，去遊行比較不緊張耶！在課堂上要對著學生老師說同性戀研究反而比較緊張，可見得還要更儲備自我。所以我覺得，形式本身是不是等於運動？我不這麼想。可是要不要做社會改造，那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不管是小組

織或大組織。

觀眾 7：我們先要做自己能做的，那些做不到的東西我不去管。然後還有一些理論化的東西，我沒有那麼高深的邏輯去思考，我不管。我能做好、我能做的是什麼東西，包括我們大家能做的是什麼東西，當然很多人做了很多、很積極的工作，為了爭取我們的權利，包括這位先生說，我們要去爭取立法的權利，這我從心底裡是非常非常感激的。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我自己也想做一些工作，但我特別支持這位女孩的說法，就是我們要先把自己能做好的、積極的這一面做出來。我想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的運動，把這些東西做好，把我們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不是說展現好的一面，而是讓它自然而然的，讓大家知道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很多人都在很好很努力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目的。有點激動，不好意思。〈眾笑〉

觀眾 8：我可以理解那個女孩說的，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想法，你們說首先要將兩方面展現出來，這是一個汲取吧！但是究竟什麼是自然而然地首先展現出來的？那不一定是你們認為的什麼陽光的一面啊！今晚來了很多中華女子學院的，其實在大陸的情況就是，現在很多人，什麼陽光、什麼正面的，所謂自以為很正常的人，他們出來讓拍了嗎？沒有啊，是吧？首先展現出來的那些跨性別不忌諱鏡頭，其實他們展現出來的就是自然而然啊！如果再有人跟我講跨性別壞話了，我就跟他生氣了。當然很多人希望同志團體展現陽光一面之類的，可以去展現嘛，可是現在，既然展現出來壞的一面了，「我們就這樣子，怎麼了是吧？」那如果你說什麼華威的那些，華威八成的 T 都是染黃毛、抽菸的，那她們本來就染黃毛抽菸啊。他們跟你家中的女性是除了性向沒有差別嗎？那她們也染黃毛抽菸哪，是吧？

何春蕤：今天我們在講同志，有一些同志他表面上是不太清楚看得出來是同志，可是跨性別同志就是藏都藏不住，他的樣子就這麼不男不女，他的樣子就這麼怪怪的，可是這就是他自己，這就是他。你不是要大家自自然然的展現自我嗎？這就是他的自我，可是每個人還是看他不順眼，來，我們等下請趙剛說說跨性別的處境，趙剛是在昆明做跨性別團體。你說跨性別面臨到什麼困難問題？台灣的跨性別面臨到什麼問題我很清楚，他把身分證亮出來，警察就懷疑他的存在，因為他的身分證寫男性，他穿了一身女裝；或者他依稀看起來是個男的，身分證上卻是個女的，警察就說你違反善良風俗，抓起來。他在學校讀書，他說「我就是不能穿裙子，我實在痛恨穿裙子」，那就會被教官、被老師叫去訓話，非得照著學校的方式穿不可。你去找工作，沒工作，公司不雇用你這個性別存疑的人。這種人你說，「哎，展現光明面、展現陽光面貌」，可是你社會沒有給人一個機會讓他能夠養得出一些陽光的力量來，你叫他展現什麼？這個就是運動在對抗的，運動在對抗的就是這種結構性的使人們沒有辦法做自己、使人們沒有辦法把他自己所有的潛力發揮出來的社會。今天不是在談什麼我要表現陽光、表現什麼，因為有些人就是沒選擇，這個社會的結構使得他沒選擇；當他沒有

選擇的時候，你跟他講要表現好的，這個話沒意義，因為這個話說的是你個人有多少實力，而你們那些想要展現陽光的，你們是有實力的啊！可是有些人想掏都掏不出來，因為他原先就被剝光了，這個被剝光的事實就是社會壓迫，這個社會壓迫就是運動要處理的，我們就是要去改變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區分方式，它要改變一個社會規範廁所一定要是男的、女的兩邊分開的方式。趙剛，要不要來講講，你們跨性別運動團體感受到的最劇烈的、最尖銳的壓迫在哪些方面？說說。

趙剛：跨性別人權首先面對的一個就是不僅是不被這個主流社會認同，同時也可能面臨著在座各位都可能表現的不認同。如果我做一個小小的民意調查，可能還是會發現百分之八九十在座的男同或女同不太認同跨性別。有的朋友會表達，「如果他們化妝畫得好一點，如果他們展現特別女人或者特別男人這樣，如果展現的是另外一個性別特別符合大家的審美需求，那他們可以去變裝、他們可以去變性。但是如果他們本身就長得不是很好看，那他們就乾脆就不要這樣做了。」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解釋，特別是對於有變性慾望的這部分朋友來說，就像你們的性取向已經由不得你們自己來選擇，他的那個性別身分的暴露也是被動的。做為男同或女同，在座的有的人確實很陽剛或者很陰柔，然後你們的性傾向的隱私、身分不一定會暴露給其他人、同伴；但是呢，對跨性別人，特別是對於有變性慾望的這部分朋友來說，那個社會已經是由不得他們自己了。

觀眾9：我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回答是還不是。爭取同性戀權利，那好的模範青年他是同性戀，我們為他們爭取權利，那那些不好的、壞的同性戀，那他們是不是也有權利，我們這個同性戀運動是為誰爭取權利？

甯應斌：在同性戀的群體裡面製造出一個特權的菁英階級，它壓迫著所有其它下面底層的暗不見光的這一群人。不但如此，我告訴你，你們也永遠得不到自由，你永遠需要說「我是一個好好的同性戀、我不隨便去換性伴侶」等等，你不會得到自由的。這絕對不是一個運動的解放之道，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何春蕙：希望今天晚上這些討論能夠繼續地發酵，能夠繼續看到一些發展，也看到大家能夠慢慢地跟其他團體聯繫起來。我們每次來，好像跟同志或者女性主義團體見面的時候都只有看到這些團體，比較沒有看到其他的團體，這次我覺得還蠻高興的，至少我看到了跨性別團體出來，我們也希望能有其他的團體慢慢地出來。我覺得今天晚上還蠻好的，因為大家很踴躍發言，也給我們很多機會看到我們可能有一些不同樣的觀察，有一些我們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可以跟各位交流，那你們所處的某一些狀態你們可以跟我們交流。我們在這邊要特別謝謝今天同志交流中心給我們這個機會，我們無以回報，除了說我們來這邊跟大家吐吐口水、講講話之類的，我們有一整疊書送給交流中心。

訪問：今天你看完這樣一個特別激烈的討論會，你有什麼看法？

觀眾 10：我從中得到很多啟發，比如說我今天得到最重要的啟發就是，同志運動一定不能拘泥於形式，你一定要看你的效果是什麼、你要達到目的是什麼，形式是其次的東西。

觀眾 11：我覺得大家兩岸交流了很多問題，然後很多話題都值得我們探討，我們發現這個活動很有意思，然後我就更堅決地支持跨性別了。

觀眾 12：我覺得很好玩哪，見到各種各樣的人還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多舉辦一些比較好玩，而且你能找到很多新的思路去看待同性戀社區和同性戀亞文化。

觀眾 13：譬如說像何春蕤說「性權就是人權」，我今天猛地反省了一下，我說我同意這句話，說得很好。然後就是要看他們的書，其實我 90 年代就擁有他們的書；然後 2005 年我們在舊金山就遇到他們幾個，都很棒，他們幾個都是非常棒的理論家和行動者，然後我真的覺得好多東西我要向他們學習。

觀眾 14：說實話，我覺得這麼著的話反而跟異性戀會差得更多一點，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真得是很正常地走在大街上的話，不用說一個群體非要這種聚會，其實跟正常人在一起，那種大家一起玩也挺好的。

觀眾 15 (Sean Dickson)：我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這個夏天我在成都愛白青年同志活動中心做志願者，這幫助我了解更多中國同志都關心甚麼議題，特別對那些願意表達自己的同志人士，中國人可以更開放地表達什麼對他們是重要的。

訪問：你今天看完一個這麼激烈的討論會，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觀眾 16：我就第一次參加這種，覺得真的是進步很多，雖然說剛才一直說不能說「解放」兩個字，但是我覺得我心裡頭得到很多解放，現在我更加堅定，就是說把我的想法、還有我對同性戀群體我的認知，告訴我身邊的朋友，或者讓更多人了解，我覺得我更有信心了。